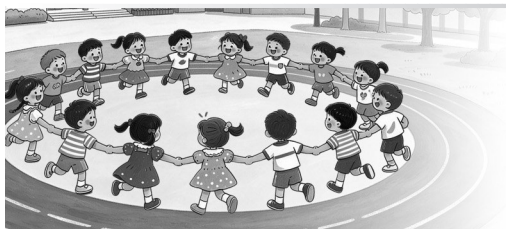

“唱游”的历史

□ 王蕾

校园里,孩子们手拉手围成一圈,一边唱着“丢手绢,丢手绢”,一边笑着、跳着、追逐着。这大概就是“唱游”最本真的模样——用歌声带动身体,用游戏点燃快乐。

很少有人知道的是,“唱游”一词可追溯到明代沈宠绥的昆曲声乐理论著作《弦索辨讹》,其中的“唱游”专指民间艺人的流动演唱,并非近代教育意义上的“唱游”。

让“唱游”真正融入中国本土的,是那一代的音乐家与教育家们。音乐家黎锦晖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《麻雀与小孩》《葡萄仙子》等儿童歌舞剧,被称为“趣味唱游课堂教学的萌芽”;教育家顾西林自1913年起专研唱游教学法,其思想经学生任雁风编写成《律动游戏》一书后,走进了更多课堂。

1936年春,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第一部专门的《小学低年级唱游课程标准》,把小学一、二年级的音乐与体育合并为一门叫作“唱游”的课。这是唱游从课堂上零星的活动,变成一门独立课程的开始。

此后,在抗战的烽火中,在解放区的窑洞和根据地的学堂里,唱游课以不同的面貌延续了下来。1938年,晋察冀边区把一至四年级的体育与唱游合科;“救亡歌曲”成了儿童歌曲与游戏的重要部分。1945年韬奋书店出版的《小学生唱游集》,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本土唱游教材之一。

不妨看看那些经典的唱游曲目。《小老鼠上灯台》只有短短四句歌词,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,它是一个完美的音乐游戏:唱到“偷油吃,下不来”时,要做出小老鼠的慌张模样,唱到“叽里咕噜滚下来”时,要原地转一圈再蹲下——短短十几秒钟,歌唱、表演、节奏感知、身体协调全都融在了一起。再如《找朋友》,孩子们一边唱“找呀找呀找朋友”一边在教室里走动,唱到“你是我的好朋友”时,要找到一个同伴面对面鞠躬握手。这个游戏看似是在“找朋友”,实则训练了孩子的乐句感——他们必须在旋律进行到特定位置时完成特定动作,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“听”音乐的结构。

不过,流行一时的“唱游”课一度退出了历史舞台。改革开放后,美育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和强调。1988年,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《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音乐教学大纲(初审稿)》,要求在低年级音乐课中恢复并增加“唱游”教学内容——这是唱游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重获国家课程的地位。1991年,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义务教育课本《唱游》,是全国第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唱游教材。1999年,上海市特级教师陈蓓蕾出版专著《跳跃的音符:唱游教学》,建立起包含身心聆听、自然歌唱、音乐游戏等七方面的方法论体系——中国特色的唱游教学法理论就此成形。2022年,教育部公布新版《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》,小学一、二年级的艺术课有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名字——“唱游·音乐”。

话

趣话古代『交通规则』

□ 戚舟

古人的交通方式虽以马车为主,但也明白“出行有道、行车有德”的重要性,更有一系列“交规”监督人们安全出行。

早在先秦时期,人们就有人车分流、行人分行的做法。《礼记·王制》中记载的“男子由右,妇人由左,车从中央”就是此意。唐朝颁布了最早的“交通法规”——《仪制令》,其中“贱避贵,少避老,轻避重,去避来”简称“四避诀”,简明易懂,成为当时尽人皆知的“交规口号”。到宋朝,官府还将这“四避诀”刻在石碑上,立于两京诸州要道,和今天的“交规标语”类似。

清朝还结合天气制定了“交规”。《大清律例》规定,如果下雪天骑马撞伤了人,不仅要赔偿医药费,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。这条“交规”一经出台,不仅减少了冬季的交通事故,也提高了人们“雪天安全行驶”意识。

假如违反交通规定,古人如何处置?

对“飙车”者,《唐律疏议》中说:“无故走车马者,笞五十。”这里的“走车马”就是策马疾驰或者驾车疾行,若敢在闹市中“超速”跑马,可是要挨五十下板子的。宋代处罚更重,且更加细分,《宋刑统》规定:“无故走车马者,笞五十……见血为伤,杖八十……”若“超速”驾车没有造成事故的,一律打五十大板,撞伤了人则要打八十下,若致人终身残疾,则“流二千五百里”。

轶事

胡适的领带藏着小秘密

□ 墨父

胡适一生着装讲究得体,在国内常是一袭长袍,到了美国则西装革履,领带更是打得规规矩矩。不过熟悉胡适的朋友都知道,他的领带里藏着个小秘密。

发现这个秘密的,是史学家何炳棣。20世纪50年代末,胡适寓居于纽约东八十一街104号,靠着积蓄和稿费过日子。何炳棣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,负责《明清社会史论》的研究。而胡适因为要配合哥大“中国口述历史学部”口述历史访问,经常去研究所录音。两人本是旧相识,那段时间来往尤其多,常约在哥大附近的“天津楼”吃饭。

一天午饭后,二人坐着闲聊。胡适那天系着一条“爱琴海”领带,是纽约当时的知名品牌。刚巧何炳棣也有一条同款,只是颜色不同,一时好奇想要看一看。当时胡适正抽着烟,心情轻松,便将领带翻过来给他展示。这一看,何炳棣发现领带下端竟有一道小拉链。拉开拉链,里面还塞着一张五美元钞票。

一问才知道,这是夫人江冬秀的主意。胡适方向感不强,出门常常迷路。若随身带钱包,乘出租车本不成问题。无奈当时纽约治安不好,小偷很多,钱放在西服口袋里极易失窃。江冬秀为此费尽心思,后来灵机一动,想到领带内衬尚有空间,便动手改装,缝制带拉链的小口袋。每次胡适出门,她就在里面放上五美元。用胡适自己的话说,“即使真被人抢了,这五元钱也够搭一辆计程车,平安回东城公寓”。

胡适一生交友广泛,往来之中不乏才情兼备的女子,而江冬秀却是包办婚姻里的乡村夫人。江冬秀仅念过几年私塾,粗通文墨,两人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相差甚远,婚姻之中确有诸多不易。但她泼辣能干,遇事果决,自有一股让胡适敬重的力量。领带里的这个小秘密,足见她的细心体贴与生活智慧。

源

“反哺”的为何是乌鸦

□ 侯杰

“鸦有反哺之义,羊有跪乳之恩”,这句流传千年的俗语,将乌鸦推上了“孝鸟”的神坛。为何遍观自然界,偏偏是通体乌黑、叫声嘶哑的乌鸦,独占了“反哺”的美名?

从生物学角度看,乌鸦是鸟类中少有的“高智商选手”,具备极强的记忆力与学习能力。更重要的是,乌鸦种群意识极强,当亲鸟年迈体衰时,幼鸟便会承担起觅食的责任,投喂给哺育自己的亲鸟。

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,“老有所养”是人们最朴素的愿望,而乌鸦的行为,恰好契合了儒家“孝悌”文化的内核。于是,乌鸦反哺的故事,从口耳相传的民间轶闻,逐渐走进了典籍史册。最早记载乌鸦反哺的文献,可追溯至西汉刘向编撰的《说苑·修文》,书中写道:“乌,鹊也,反哺也。”

其实,乌鸦的形象并非一开始就与“孝”绑定。先秦时期,乌鸦曾是“神鸟”的象征。《周礼》记载,周天子祭祀时,会用“乌牲”献祭,以求风调雨顺。汉代画像石中,乌鸦常与西王母相伴出现,被视为祥瑞的化身。随着儒家文化的兴盛,乌鸦的“神性”慢慢让位于“孝性”。唐代诗人白居易《慈乌夜啼》中“昼夜不飞去,经年守故林”的哀鸣,传唱至今。

浙江义乌的得名,更是有着

乌鸦衔土助孝子的美好传说。秦代孝子颜乌自幼丧母,与父相依。父亲亡故后,家贫的他徒手掘墓,其孝行感动天地。曾被他救助的乌鸦率同伴衔土筑坟,喙破滴血,泥土染成紫红色。秦王政二十五年(前222年),会稽郡为彰其孝,设邑名“乌伤”,后几经更名,最终定名“义乌”。

现代科学研究表明,乌鸦“反哺”的行为,更多是种群内部的互助行为。但这并不妨碍“乌鸦反哺”的故事流传至今,它早已成为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道德印记。